

苦难—— 我拿什么面对你？



2014年9月9日，在北京东宫影剧院观看来自巴西的戏剧《喀布尔安魂曲》，是部好剧，值得品鉴。此剧打破我原有的肤浅偏见——认为巴西只有足球和桑巴舞。剧场布置简单明了，演员敬业而又富于激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那精妙绝伦的现场配乐师，他手中来回倒换的乐器如神器一般带来充满激情和震撼的现场感，如果没有他，整部剧必将逊色不少。

不过，我更想说的是故事情节，以及由此带给我有关苦难的思索。据说，该作品的创作灵感源于一幅著名的摄影作品：1999年11月，一位穿戴蓝色面纱的女人，在喀布尔的一个体育场被公开处决。创作者对此很是着迷，决意自己走入这幅作品的场景并试图给大家讲述背后的故事，然后告诉我们：面纱笼罩下的女子是谁？她做了什么？拥有怎样的人生？于是，有了现在的戏剧《喀布尔安魂曲》。

得知这一背景，让我想起几天前的深夜，在熙熙攘攘的纽约时代广场街头，在一家名为“Forever Twenty one”的灯火通明时装店门口，伫立着一位头戴灰色面纱的姑娘，全身似乎都被灰色布条罩住的她，只留出目光深邃沉静又略带忧伤抑郁的双眼，与周遭的街景构成鲜明对比。令人印象深刻，浮想联翩。

她在等谁？又有怎样的故事？

《喀布尔安魂曲》讲述的是一个远方的故事，不仅仅是地理位置上，还在于心理和精神上。喀布尔是阿富汗的首都，和伊斯兰文明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且曾经辉煌灿烂，但是现在却陷入困境。这种困境既体现在经济、科技等器物层面，也体现在心灵和精神层面。尤其是塔利班上台执政期间，阿富汗1800万人口中有数百万人死于战乱，将近600万人流亡海外。现在的喀布尔，由于历经各种战争和混乱，只有少数的人拥有正常的水电供应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都无保障，层出不穷的战争使得大量难民涌入，让这座老城不堪重负，生活在此城的人民面临各种各样生活困境和人生苦难。

剧中人物生活的背景正是塔利班执政的1997年。一对姐妹所在的两个家庭，面对的是病痛的折磨、工作的压抑、贫穷的滋味，以及失业和争吵，像是这个苦难盛行的世界上的大多数不幸家庭所遭受的困境一样。所不同的是，他们所有这些苦难困境都是在塔利班政教合一的独裁专政统治之下。而最能体现这个统治特征的就是开场中长达几分钟的各种铁规播报：严禁跳舞；严禁打牌下棋放风筝；严禁写书看

电影；严禁拍照画像；严禁各种音乐，否则被逮捕；严禁青少年出入商业场所，否则被逮捕；孤身女性上街一经发现将被殴打；严禁女性主动跟人讲话或与人对视；严禁裁缝制作女装或为女性量体；严禁男医生为女性看病；犯通奸罪的人将被处石刑；女性必须戴面罩；没有兄弟或丈夫陪同女性不得出家门；不能露出身体的种种部位否则将被鞭刑；不能染指甲否则被剁掉；不能在河边洗衣服否则本人及其丈夫将被惩罚；不得留欧美发型；男性不得刮胡子否则将被投入监狱直到胡子长足够长……

这些让人不寒而栗的禁令，听着都让人有窒息感。为此我赶紧呼吸一下东宫剧场所透露出的自由宽松的空气。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的第一个幸运之事就是出生在一个好的城市里。我心里默念：还好，幸亏我在此时此地，尤其是作为一名女性。

庆幸之余，马上想到：这样的思考方式是不是太麻木甚至太残酷了？喀布尔所发生的一切，那个头戴面纱即将代替妹妹被处决的女性所面临的一切，真的与当下的我扯不上任何关系吗？他们备受压抑，孤独无望，看到她们的悲惨，同情她们，甚至流下几行清泪，然后珍惜自己幸福的生活。这样的思路未

免过于庸俗不堪吧？所以我继续让大脑运转，看看还能想出些什么来。

我想到，苦难，无处不在的苦难，几乎是剧中人物生活的基调。尽管里面有贫贱夫妻的温暖相依，有困顿失意下的轻歌细语，有对明天的向往希冀，甚至有舍生忘我的亲情大爱，但是整部剧被开场那些冰冷残酷没有人性的铁律所紧紧捆绑，深深压抑，铺天盖地弥散在生活的每个细枝末节。这些亮点就像是天边乌云的金边，当我们放眼望去，黑压压的乌云，其遮天蔽日的架势让这些金边显得弥足珍贵，又那么微弱无力。

然而，正是这些金灿灿的光亮所在，让我看到希望，拥有力量。外在环境越糟糕，这种精神力量就越重要。否则，堡垒一旦从内部塌陷，苦难横扫之处，所有微弱的希望之光都被浇灭，人生就无以为继，彻底绝望了。

我还想到，是谁造就了这些苦难？是谁让蓝天布满乌云，让大地邪恶肆虐？对于本剧而言，喀布尔的悲剧是由塔利班这个残暴荒诞的政权导致，这显而易见。然而，塔利班完结了，这些悲苦就不存在了吗？或者说，如果不是塔利班掌权，1996—2001年的喀布尔就会是太平盛世、欢乐祥和吗？

就剧中人物而言，如果没有开头的那些禁令，毫无疑问，他们会生活更好。然而，对于不曾拥有建制性宗教的我以及所处的社会，对于大多数时候学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我以及我的同胞，是否能理解那些我们看似残暴禁令的源头，实质上正是大多数虔诚穆斯林最深厚的精神寄托所在，是他们终极关怀之所系。古人云彼之砒霜、吾之蜜糖，尚好理解。然而，当彼之砒霜和蜜糖混为一体的时候，往往就超出我有限的想象。

宗教与战争，或者说宗教与苦难，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21年前塞缪尔·亨廷顿所著《文明的冲突》一文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人们广泛持久地思考与争论。亨廷顿教授认为：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和承认彼此界限十分重要。他还预言，世界七种文明之间，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会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或挑战。

亨氏的观点像激光一样，单纯而又深刻，直抵人类灵魂深处。然而，如果我们认为宗教要为这些苦难负全责，是不是在污名化宗教的同时，低估了人性中恶的力量？

《喀布尔安魂曲》中推动整个故事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情节：受过良好教育的妹夫向广场上遭受石刑的女子投掷了石头，回家后悔恨不已，看自己双手的眼神充满深深的自责与困惑（演员的表现非常到位并有感染力），他也因此遭受妻子的唾弃，并因此引发夫妻大战最终意外死亡。

有人会说，妹夫的作为与环境有关，他失业贫穷，困顿潦倒，因此抑郁愤恨，而投掷石头给遭刑罚的女子正是自己负面情绪的宣泄而已。果真如此吗？如果这样的话，按照此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南京大屠杀是因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所谓“军令如山”，所以日本鬼子大开杀戒；我们还可以说卢旺达大屠杀是因为当时血腥的气氛以及集体疯狂的环境，所以前一分钟和睦的邻里，后一分钟就可以兵刃相见，尸横遍野；甚至说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惨绝人寰的邪恶，是因为执行者被洗脑所致，因为他们本人在自己的家庭里也是孝子贤孙，还热衷艺术。

其实，不是这样的。事情不能

仅仅这样解释。苦难不能这样就算过去。永远不要忽略还有一个维度，就是人的维度，人性的维度，人性中与良善并存的那个邪恶的维度。

1971年，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为了验证“恶魔”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所做的“监狱实验”以及后来的著作《路西法效应》就揭示了深刻复杂又包含邪恶成分的人性。这一点在社会学家汉娜·阿伦特的报告《艾希曼受审于耶路撒冷：关于邪恶的平庸性的一份报告》中也有所体现。报告分析纳粹集中营中的杀人犯是否在权威压迫下才去杀人，结果证明不是的。其中，在对屠杀行动的决定性人物阿道夫·艾希曼的评价中写道：艾希曼的问题正是在于，他跟太多人其实没有两样，他们既不是变态也不是虐待狂，而且他们过去是、现在也仍是可怕且骇人的正常人。从法律制度及道德判断标准而言，这种正常性比所有暴行总和都还令人震惊，因为这意味着……此一新类型犯罪者的确是人类公敌……在他几乎不可能知道或不觉得自己做错的环境下犯下这些罪行。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邪恶的魔鬼，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健康正直、思维正常的人，在一定的情境下（此剧中这个试水的情境是塔利班政权），这个魔鬼都会被释放出来，最终让这个原本修养很高的人变成冷酷无情、残暴嗜血的狂徒。只是世间鲜有人能够运用有限的智慧来分清，究竟特定的情境和人性的邪恶之间的边界在何处。因此，究竟用多大的气力来限制或者引导人性发展，再用大多的气力来发展合理合适的情境，就变成世间无比深奥、争论千年不停歇的话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